

等了1654天的公義

有話要說

博 梁

昨日，是非法「佔中」爆發第一千六百五十四日的日子，這一天，「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名均告成立，戴、陳二人另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的罪名同樣成立；同案其餘六名被告也分別有一至兩項罪名成立。承擔刑責的時辰，似乎終於來到了！

筆者縱然用上「承擔」二字，但是，由於求情程序尚未完成，最終九人是否會被判處監禁刑罰？刑期會有多長？抑或又是社會服務令了事？整個社會縱然高度關注，但一切仍然有待法官裁決揭盅。且值得注意的是，九名被告之中，有人要求法官判處社服令，有人則代表他人提出此一要求，有人在審判來臨前已事先張揚會提出上訴。可以說，事情毫無疑問還有很多變數。

這一千六百五十四日，香港人等等等實在太苦、太久了。「佔中」那七十九日固然充斥着荒誕與暴力，而「佔中」過後，所謂的「公民抗爭」，基本上都是充滿着偏激、仇恨和歧視，這些「抗爭」具體體現在「鳩鳴園」、「光復行動」、無證內地男童匿港九年風波、焚燒基本法、球場噓國歌、西貢炸彈案、校園衝擊、「港獨」進擊等等。當然，最令人憤怒和悲哀的，始終是那場劃破香港和平夜空的旺角暴亂。

戴耀廷等三人，二人是學者、一人是牧者，三「者」打開的潘朵拉盒子，在這一千六百五十四日裏頭，毫無疑問為香港，特別是年輕人帶來了極其深遠的禍害。校園外，年輕人參與暴力行動鋸鑄入獄，斷送一生前程；校園內，「港獨」和辱師之風悄然颺起愈演愈烈，有學生因此被停學和踢出校時才如夢初醒恨錯難返。說到底，這些年輕人，無不是相信了所謂的「公民抗命無罪」。害苦他們的是誰？是戴耀廷他們！

判刑的日子，或許還要等上一段時間，不過，戴耀廷之流罪名既已成立，當務之急，乃是港大從速啓動紀律聆訊程序，研究解僱觸犯刑事法律的戴耀廷。否則，一個這樣的罪犯，竟然可以繼續大搖大擺在港大自由行走，繼續公然在法律學院「教」法律、暗地散播違法意識，這確實是對香港法治最大的諷刺。莘莘學子是香港的未來，受害受荼毒乃是一個也嫌多。就請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和港大校長張翔，展現你們的決心和良心吧！

「佔中」遺禍深遠餘痛未止



西九龍裁判法院宣判，法官裁定9名被告人大部分控罪罪名成立，昨午開始聽取各被告求情，各人獲准保釋候判。

戴耀廷在法官宣判前夕選發表嚇人的言論，聲稱未來都會努力為香港爭取民主、推動社會民主云云；又期望判決能刺激公眾反思運動的意思，吸引更多入於11月區議會選舉中投票。

戴耀廷發動「佔中」亂事，硬說為「公民抗命」固然可恥，而被起訴後仍發表會堅持「搞事」的言論，更是不知悔改，實甚可悲。其實，非法「佔中」的性質根本就是一場破壞社會安寧、打擊法治精神、衝擊經濟民生的違法事件，與崇高的「公民抗命」精神完全沾不上丁點的關係。

「公民抗命」的概念由美國民權思想家梭羅在19世紀提出。「公民抗命」的精神是運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拒絕遵從一些不當、不公及不義的法律或政府政令，從而迫使政府修訂或廢除有關法例，使法律能彰顯公義。印度聖雄甘地帶領的非暴力印度獨立運動，便是「公民抗命」的典範。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將「公民抗命」概念進一步發揚，他認為「公民抗命」是指「公開的、非暴力的，及建基於良心及追求公義的行為，是維護社會大多數人士的正義和公義原則的行動，但要服從司法制度的後果」。

實踐「公民抗命」者會以和平手段故意違反法律，並自願接受法律制裁，以表達一些法律條文的非公義，從而爭取公眾關注及支持，使政府修改相關不公義法律條文，追求心目中的社會公義。

但戴耀廷等9人在2014年發起「佔中」，叫出「公民抗命」的口號，哄騙一些無知的市民參與非法堵塞金鐘道路的行動，之後這股「堵塞」歪風更蔓延至銅鑼灣、旺角等區，對經濟民生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本文嘗試借用「公民抗命」的三項標準，指出「佔中」根本就不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

絕非「公民抗命」可掩飾

「公民抗命」的第一項標準是和平抗爭。在79天的「佔中」過程中，參與者發動的暴力事件，真是不勝枚舉。10月14日晚警方清理金鐘「佔領區」障礙物時，逾千名示威者突然堵塞金鐘龍和道，警方拘捕了45名涉嫌非法集結、阻差辦公的示威者；10月17日清晨，警方清除旺角「佔領區」路障及帳篷，並驅散附近人群，大批示威者「佔領」多條街道，其間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11月30日晚至12月1日凌晨，「雙學」在30日晚上9時在金鐘「佔領區」宣布行動升級並圍堵政府總部，大批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線佔據全條龍和道，警察使用催淚水劑及發射火炮驅散，多名示威者及警員受傷。「佔中」期間，暴力事件不斷爆發，令市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佔中」不但不是一場「和平」抗爭，相反它只不過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暴力運動。

「公民抗命」的第二項標準是發起者與參與者都有崇高的道德情操。「佔中」發起者在煽動市民參與時，強調行動不合法，並須絕對非暴力。參與「公民抗命」的人因公義目的而甘心接受懲處，將會對社會產生道德感召力，帶動整個社會不同階層人士反思香港的未來。但9位發起人在法庭上表現如何？他們不甘心接受法律的懲處，他們違背承諾，企圖逃避刑責、出爾反爾，何來崇高的道德情操？

「公民抗命」的第三項標準是服從司法制度，接受追究刑事責任。「佔中9人」被控多項串謀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在審訊過程中9人全部否認控罪，其中一位被告鍾耀華更反問：「（我們）何罪之有呢？」黃浩銘則謂：「『雨傘運動』無罪」。真正相信「公民抗命」者（如甘地）理應是自願及主動接受法律制裁。「佔中9人」在審訊過程中全不認罪，令人認識到「佔中」實在不可稱為「公民抗命」。

9人煽動香港年輕一代參與非法「佔中」，令社會日益撕裂，遺禍深遠餘痛未止，衍生出一批「港獨」暴力組織。「佔中」只是一場被着「公民抗命」外衣，實質上只是一場違法搞亂社會秩序的動亂。這9人到底有什麼企圖，只有他們自己才知曉。期望終有一天，他們能深切反思自己在「佔中」所犯之過錯，向全港市民道歉認錯，堂堂正正地當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

法官否定「佔中」是「公民抗命」

在2014年發動「佔中」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連同其餘六名反對派政客，因涉嫌串謀、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而被起訴。案件經過近半年審訊，終於在昨日作出裁決，九名被告均至少有一項罪名成立。可以說，今次「佔中9人」案的判決，對受「佔中」影響的商戶和市民，以及整個香港社會來說，算是給了一個交代。

更值得留意的是，對於反對派過去一直宣揚的某些觀點，法官在判詞裏都有加以反駁。譬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過去便一直強調，他們發動的「佔中」是一場所謂的「公民抗命」。法官則在判詞裏引述了賀輔明勛爵在R v Jones（Margaret）[2007] 1 AC 136一案的判詞，反駁了他們的論點和主張。

該段判詞的原文是：「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證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這段判詞的重點有兩個：一是公民抗命「要合乎比例」、「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然而，整場「佔中」歷時七十九日，市區的主要幹道均被堵塞，侵害了市民的行動自由，妨礙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屬「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

正因如此，法官才會在判詞中批評陳健民，竟然用三人無意完全癱瘓中環一帶的交通，作為

非法「佔中」九名組織者，昨日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這是兩年來一系列「佔中」案中最受矚目的一宗判決，被告戴耀廷、陳健民等首惡分子，是否得到了阻嚇性的刑期，受到香港市民高度關注。如果是在外國勢力干預下，案件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就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搞亂香港秩序的人只付出很輕的成本，今後香港將會陸續出現類似「佔中」的事件，顛覆香港的繁榮穩定，外國勢力今後將會變本加厲干預香港內部，七百萬人的福祉和飯碗將會受到威脅。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2013年1月16日發表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文章，說要向香港扔出「核彈」。到了被判決前夕他仍然沒有悔意，在宣判之前繼續煽動年輕一代，發表了激進的言論：「不要失落、不要放棄」；「暫時我估計唔會好似旺角事件判刑咁長，應該仲可以應付到」；「呢場波係打聯賽，輸咗一場，只要輸得唔係好多，我哋總有機會贏返轉頭」。這說明了戴耀廷賊心未死，還要再搞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顛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特區政府，企圖奪權上台。他還認為判處刑期不會很長，他完全可以挺得過去，捲土重來。戴耀廷依然這麼高調，同美英勢力在背後發功，提供策略、法律的援助很有關係。

昨天，前港督彭定康發表聲明說：「香港政府應團結社群時，卻用了過時的普通法控罪，對2014年發生的政治事件尋求復仇，造成令人震驚的分裂」。美國和彭定康密切呼應，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也同步發表聲明：「『佔中九子』被判罪成，是懲罰和平的政治異議，縮小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空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主權受到侵蝕」，「促請香港政府要捍衛法治及自由」。

美國和英國的策略是露骨而且清楚，他們把「佔中」說成是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如果香港法院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法「佔中」的人罪名成立，就是侵犯了人權和自由，他們就會繼續對香港法院判決進行露骨的干預。美國和彭定康都採取了雙重標準，他們忘記了美國出動了騎警和暈眩彈驅散、拘捕參加「佔領華爾街」的民眾，當地法院更判處滋事分子監禁，最長刑期為十四個月。英國也採取暴力鎮壓行動，拘捕「佔領倫敦」的民眾。

為什麼英國和美國不會將發生在當地的「佔領行動」看作是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為什麼他們將佔領視作罪行？為什麼美國可以對佔領者判刑，香港卻不可以？所以，美英的所謂「言論自由論」、「集會自由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是非常露骨的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越權行為。

特區政府希望通過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但是，反對派卻以為「良機」難遇，不惜地開假面具，採用種種極端手段，對政府百般發難。

一是與境外勢力勾連，充當打「香港牌」的先鋒。反對派不僅試圖製造一個又一個莫須有的理由阻擾修訂條例，還尋求境外勢力的幫助。於是乎，人們看到一路人馬前往台灣，煽動台灣當局及「立委」反對修訂條例；另一路人馬跑去美國告「洋狀」，哀求美國政府恐嚇特區政府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

二是企圖用暴力阻擾修訂《逃犯條例》。三月中旬，反對派組織「香港眾志」多人強闖特區政府總部，聲稱要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並與維持秩序的保安產生衝突，致使1名女保安受傷。

三是與「港獨」組織勾連，舉辦反對《逃犯條例》遊行，令遊行變成了宣揚「港獨」的大遊行。據報道：此次遊行中反對派頭目幾乎全部出動，而「港獨」組織也乘機宣「獨」，揮動「香港獨立」的旗幟。一些人甚至將「血饅頭」扔向政府總部門口的國徽，「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要挾稱，若政府不撤修訂，將考慮發動包圍立法會。

意見前後矛盾邏輯混亂

最令人不能接受的，卻是大陸師公會（「公會」）通過發表所謂的「法律意見」誤導民眾。筆者閱讀公會日前發表《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書後，發現該意見充滿了「法律傲慢」和「法律邏輯混亂」，必須糾正之。

先說說「法律傲慢」問題。大陸師公會稱香港現行法制框架限制與內地建立長期的正式安排或者一次性個案移交安排，並非漏洞，而是參考了內地與香港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內地的人權保障紀錄之後慎思而達的決定。言下之

焦點評論

文兆基

他們有衡量行動「要合乎比例」的根據，是「絕對錯誤」（totally wrong）。因為即使沒意圖完全癱瘓中環一帶的交通，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已對其他人造成過度的損害或不便。法官又批評陳健民，在「佔中」爆發個多月後才在報章撰文，提及行動不應對其他人造成過大影響，是「醒覺來得太遲」（the awakening came much too late）。

罕見以「絕對錯誤」狠批

這段判詞的第二個重點，是示威者「應接受法律的懲處」，亦即是三人在發動「佔中」之前，曾一直所強調的「承擔罪責」。是故，法官在判詞中強調，不論被告是否主張「公民抗命」，或是因發動「公民抗命」而被起訴，「公民抗命」均不是抗辯理由，法院亦沒有功能，去判斷被告發動的「公民抗命」背後的政治理念是否正確，而是只會把焦點放在他們行動的內容，究竟有否觸犯法例。

說起「承擔罪責」，這班人真的遵守諾言嗎？沒有，戴耀廷等人雖在「佔中」後期，主動去了警署自首，但到了律政司正式起訴的時候，卻選擇

彭定康企圖干預香港法庭判決

焦點熱議

陳光南

美國和英國的策略是露骨而且清楚，他們把「佔中」說成是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如果香港法院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法「佔中」的人罪名成立，就是侵犯了人權和自由，他們就會繼續對香港法院判決進行露骨的干預。美國和彭定康都採取了雙重標準，他們忘記了美國出動了騎警和暈眩彈驅散、拘捕參加「佔領華爾街」的民眾，當地法院更判處滋事分子監禁，最長刑期為十四個月。英國也採取暴力鎮壓行動，拘捕「佔領倫敦」的民眾。

為什麼英國和美國不會將發生在當地的「佔領行動」看作是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為什麼他們將佔領視作罪行？為什麼美國可以對佔領者判刑，香港卻不可以？所以，美英的所謂「言論自由論」、「集會自由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是非常露骨的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越權行為。

為什麼英國和美國不會將發生在當地的「佔領行動」看作是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為什麼他們將佔領視作罪行？為什麼美國可以對佔領者判刑，香港卻不可以？所以，美英的所謂「言論自由論」、「集會自由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是非常露骨的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越權行為。

大律師公會不應該為政治而失公義



議事論事

顧敏康

意十分清楚，就是自以為香港法律制度優越，忘記了香港是「一國」之內的香港。即使按照公會的邏輯，公會是否抗議過政府與其他司法排名低的地區（如菲律賓）簽訂引渡協議呢？再看看世界上有54個國家與地區與內地簽署引渡條約，其中包括法國、比利時、澳洲等反對派眼中視為充分保障民主人權的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亦與內地簽署了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可見，制度差異並不影響簽署有關協議，關鍵是建立一套有效的移交逃犯的機制。公會這種「法律傲慢」既有其教育背景，也可能基於政治立場，但應該不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義，與公會章程第1條「竭力維護社會公義而非任何政治立場」是相悖的。

再說公會的「法律邏輯混亂」問題。大陸師公會稱，讓特首簽署證明書啓動個案移交，立法會無法把關問責是缺乏制衡。表面上看似有理，其實不然。政府修訂法案在立法會過三讀就是立法會在把關問責，存在制衡機制；修訂法案通過後，制衡依然存在，只不過改成了法院制衡。再說了，香港的做法是仿效英國、加拿大沿用多年的做法，沒看到有運行不暢順的地方，為何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機制，香港使用就被指責為缺乏制衡呢？

公會一方面聲稱內地法治水準不足才是移交逃犯不包括內地的原因，也是雙方未訂下長期移交協議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又說，政府不應該訂一次性引渡協議，而應當與內地簽訂長期的協議。邏輯混亂就在於：既然不信任內地，又如何簽訂長期協議呢？一次性協議都已經讓反對派走極端，更何況是長期協議？

否認控罪。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利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把起訴說成是重複控罪，侵害了《基本法》所保障市民參與和平示威、集會權利，繼而把案件包裝成政府的報復性檢控。如此說來，他們又怎有資格話自己在搞「公民抗命」呢？

說到他們的詭辯，法院早在審訊之前，已指出「煽惑他人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是兩項控罪，前者是煽惑他人犯罪，後者是煽惑另一人跟自己一同煽惑他人，並不構成重複控罪，而且在普通法內存在。至於《基本法》所保障的集會自由，法官則強調：「今次阻礙的不合理性已使到重要而受保障的示威權應被置換」（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e obstruction was such that the significant and protected right to demonstrate should be displaced.）。

簡而言之，今次判決對「公民抗命」的看法，雖然跟之前終審法院一樣，承認「在良心的基礎上的公民不服從在（普通法制度下）有悠久而光榮的歷史」，但是不能構成脫罪的抗辯理由。另一方面，法院認為集會自由的行使，如對市民的行動自由和日常生活構成損害，便是「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不屬《基本法》所保障的集會權利。最重要的是，判詞其實批評了幾名被告，根本沒遵守「公民抗命」所默認的規則，間接地否認了他們在搞「公民抗命」。

時事評論員

彭定康指「煽惑他人公眾妨擾」是過時的普通法罪名，這說法是包藏禍心，是為戴耀廷、陳健民等九名被告提供上訴策略和武器。英國人很清楚她知道，任何上訴到了高等法院，就有陪審員負責裁決案件，一旦「佔中9人」案的陪審員大比數是「黃絲」，這樣就可以扭轉結果；倘若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又不乏與他們價值觀念相近的常任和非常任法官。

昨日，已有反對派組織、學者為戴耀廷等九人將來上訴提供了策略，並引導輿論。他們說「煽惑他人公眾妨擾是措辭含糊的控罪」；稱裁決「收窄了言論自由」；又說今次案件最具爭議是「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有關判例已經是很古老的事情了，不應該再在今天引用；「煽惑公眾妨擾罪是上訴關鍵」；「有3個法律爭論點可作上訴，包括妨擾罪的定義及是否適用於此案、妨擾罪本身是合憲或違憲，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罪的定義應如何理解」，云云。

彭定康的高調表態，嚴重地干涉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他與反對派更扮演師爺的角色，對裁決指指點點，為上訴出謀策，這說明外國勢力企圖向香港法庭施加巨大壓力。所以香港七百萬市民應該提高警惕，要注視着外國勢力在香港利用戴耀廷繼續搞「港版顏色革命」的陰謀，要緊記彭定康一九九六年所言：「英國人雖然撤退出了香港，但是英國的政治影響力和戰略盟友仍然在發揮作用」。

資深評論員

再者，公會認為一次性個案特別移交安排這將成為特區政府應對內地當局移交逃犯要求的常態。當常態已定，香港與內地就更不會有任何誘因去商討訂立一份經仔細考慮及對公平審訊和人權有保障的長期協議安排。公會應當知道，當個案移交因次數增加而變成所謂「常態」時，說明兩地在移交方面互信增加和運作順利，應該更加有「誘因」去促使雙方商談長期協議安排呀！

公會失專業誤導公眾

在現行條例下，要求移交一方向特區法庭提交的證據，要經當地法官等司法人員核證；而新修例新增條款，除當地司法人員外，經「有關訂明安排所訂的方式」核證的文件，也可獲接納。公會聲明由此認為，強調現行核證安排是防止當地行政機關濫用移交，質疑修例實際上廢除當地司法機關認證，令申請要求更寬鬆。

所謂「令申請要求更寬鬆」的說法其實在誤導公眾。新增條款是為了實際操作的便利，並不等於降低移交門檻。道理很簡單，因修例後以個案形式移交逃犯的安排要適用於所有地方，而部分實行大陸法的地方，移交逃犯申請不是由法庭提出，而是由政府檢控官或其他官員負責。筆者也完全同意，核證程式和證明有否犯罪是兩回事。尤其是應該相信香港法院對被指犯罪者的司法保障，會考慮該犯罪人被引渡之後，是否會受當地不公平審訊或對待。

行文至此，想引用大陸師公會前主席湯家驊的一番話：「大陸師公會作為專業團體，非常希望能用中肯、全面的角度提供專業意見，而非為推動某一政治立場，發表聲明」。筆者認為，這既是湯先生對該公會的失望之情，也是對公會發出警示：法律人應該堅守其所信仰的公平、公正和公義，公會不應該為政治而失公義。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